佛光山 人间佛教 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溯源與流變——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王鶴琴
青島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

中文摘要

十八羅漢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產物，是中國羅漢信仰的重要形式，自唐代產生後迅速發展，影響遠超過「正統」的十六羅漢。歷史上關於十八羅漢多出來的兩位究竟是誰，一直沒有定論，由此出現不同的系統。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是中國羅漢信仰的最新發展與重大變革，尤其是將具名的女性羅漢吸納進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彰顯了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的弘法宗旨。

關鍵字：十八羅漢　星雲大師　女羅漢

Origin and Evoluti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he Eighteen Arhats in Fo Guang Shan

Wang Heq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Q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ighteen Arhats are significant products of sinicization in Buddhism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arhat beliefs. Throug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ts appearance since the Tang dynasty, the veneration of the Eighteen Arhats has gained wider influence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Sixteen Arhat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re is no clear consensus on who were the two additional arhats. As such, two different systems developed. The Eighteen Arhats in Fo Guang Shan ar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arhat beliefs. The inclusion of the female arhats etched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values upheld in the current era. Also, the addition of the arhats reveals the original intents of the Buddha as advocat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Keywords: the Eighteen Arhat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female arhats

佛光山 人向佛教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前言

佛教中與十八這一數目有關的人物團體，最早出現於隋代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1] 唐代法琳（572-640）上書駁傅奕，引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人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不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2] 湯用彤指出，「其言出道安、朱士行錄云云，乃為佛徒偽造」；而關於釋利防來華，梁啟超認為可信，湯先生則說「遠於事實」。[3] 無論如何，唐代時與十八數目有關的人物群體大量湧現，在這一背景下，佛教十八羅漢的組合形式應運而生。

一、十八學士、十八高賢與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是中國人的創造發明，沒有任何外來依據。很明顯，十八羅漢是在十六羅漢的基礎上演化出來的，可是這一演變的動機是什麼？過程究竟是如何進行的？目前學術界尚沒有定論。

關於十八羅漢的最早紀錄，見於唐代李華（715-766）所作〈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碑文記載僧人道一於天寶十三年（754）春，「忽灑飾道場，端理經論，惟銅瓶、錫杖留置左右。具見五天大德、十八羅漢，幡蓋迎引，請與俱西。二月八日，恬然化滅。報齡七十六，僧臘五十七」。[4] 這裡的十八羅漢作為接引僧人往生西方淨土的使者，反映出十八羅漢的起源很可

1. 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卷 1，《大正藏》第 49 冊，頁 23 下。
2. 唐．道宣撰：《廣弘明集》卷 11，《大正藏》第 52 冊，頁 166 上。
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海：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8。
4.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319，上海：中華書局，1983 年影印本，頁 3234。

能與彌陀淨土信仰有關，而且起源的時間在唐代，起源的地點很可能就是杭州。

中國的彌陀淨土信仰，肇始於東晉時期的廬山慧遠（334-416）。慧遠曾與一百二十三人結社，共期西方，後來有了蓮社的名字以及「十八高賢」的傳說。十八高賢這一傳說究竟起源於何時，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應為中唐以後。[5] 在這之前，法琳的《辯正論》和飛錫的《念佛三昧寶王論》皆未言及蓮社、高賢之事。飛錫法師身世不詳，唐玄宗天寶初年（742）曾遊化京師，後居住在終南山撰寫《念佛三昧寶王論》。白居易（772-846）為劉軻作〈代書〉一文，謂「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6] 首見「廬山十八賢」之說。

在〈沃洲山禪院記〉中，白居易還提到了「十八高僧」和「十八高士」：

> 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道、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度、殷融、郤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昉、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7]

可見，白居易對於這種以十八為數的人物組合非常熟稔。而在李劍鋒為湯用彤《十八高賢傳》偽作說所作的補正文章中，根據皇甫冉（717-770）〈望南山雪懷山寺普上人〉和戴叔倫（732-789）〈與友人過山寺〉兩詩指出，中唐

5. 同註 3，頁 294。
6.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677，頁 6920。
7.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676，頁 6905-6906。

佛光山 人向佛教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時期肯定有蓮社之名，且盛唐時期也難以遽然排除在外，到晚唐蓮社之名則很普遍了。[8]

〈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在記敘僧人道一的交遊時，提到「廬山師友，今古一時」，[9]可見道一對於廬山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很大的可能是，唐代天寶年間（742-756），隨著彌陀淨土信仰的發展，出現了「廬山十八高賢」的傳說。玄奘（602-664）翻譯出《法住記》以後，有名號的十六羅漢很快流行開來，極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附會廬山十八高賢的傳說，從而創造出十八羅漢，時間當在廬山十八高賢的傳說形成之後不久，也在天寶年間。由於廬山十八高賢與彌陀淨土的緊密關係，十八羅漢最早也與往生西方相聯結，成為臨終接引的聖眾。而廬山十八高賢的傳說又是如何誕生的呢？

在廬山十八高賢流傳以前，唐代已經有一組為時人熟悉的以十八為數的團體，那就是「十八學士」。唐太宗在做秦王時曾開文學館，納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十八人，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號為「十八學士」，後薛收亡，召劉孝孫補之，復命閻立本（約 601-673）為十八學士畫像， 即為《十八學士寫真圖》，褚亮（560-647）作像贊，題十八人名字、籍貫、官爵，藏之書府，時人欽慕，謂之「登瀛洲」。[10]

武則天時，「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監王紹宗等十八形象，號為《高士圖》」。

8. 李劍鋒：〈從接受史的角度蠡測陶淵明與慧遠之關係——湯用彤先生《十八高賢傳》偽作說補正〉，《九江師專學報》2003 年第 3 期，江西：九江師專。

9.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319，頁 3234。

10. 汪文學：〈唐太宗與十八學士〉，《文史天地》2006 年第 2 期，貴陽：貴州省政協辦公廳。

（《舊唐書》卷 9）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真、趙玄默、毋煚、呂向、咸廣業、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為十八學士，命董萼畫像，御制贊，記錄十八學士的姓名、表字、爵位、籍貫等。

作為翰苑盛事，「十八學士」的影響非常大，這一題材也為畫家所喜好，上行下效，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中，仿造出十八高賢和十八羅漢是非常合理的。英國學者托馬斯．瓦特斯（Thomas Watters）早在十九世紀晚期，就提出十八羅漢的起源與唐代的「十八學士」有關，他並且指出，十八這個數字對於唐王朝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統治者的姓氏「李」拆解開即「十八子」。雖然瓦特斯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非常流行，然而一直未能為漢語學術界所重視。

瓦特斯未能就十八羅漢與十八學士之間的聯結尋找出歷史或理論的線索，[11] 我們認為，這個中間環節恰恰就是「十八高賢」。因此，可以說，十八羅漢的起源不是一種孤立的宗教文化現象，它受到當時政治風尚和信仰新貌的影響，是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的產物。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下冊有貫休（832-912）〈題十八賢影堂詩〉，《全唐詩》卷 844 之齊己（863-937）詩，題作〈題東林十八賢真堂〉：「白藕花前舊影堂，劉雷風骨畫龍章。共輕天子諸侯貴，同愛吾師一法長。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何人到此思高躅，嵐點苔痕粉滿牆。」齊己還有〈東林作寄金陵知己〉詩，其中有云：「十八賢真在，時來拂榻看。」李中〈題廬山東寺遠大師影堂〉一詩云：「遠公遺跡在東林，往事名存動苦

11. Bong Seok Joo, *The Arhat Cult in China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irteenth Centuries: Narrative, Art, Space and Ritual*, Dissertat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7, p.128-129.

佛光山 人向佛教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吟。杉檜已依靈塔老，煙霞空鎖影堂深。入簾輕吹催香印，落石幽泉雜磬音。十八賢人消息斷，蓮池千載月沉沉。」

據此可知，晚唐詩人對於慧遠與十八高賢共結蓮社的典故已經非常熟悉，而且廬山東林寺曾有十八高賢的「影堂」或「真堂」，即供奉慧遠與十八高賢畫像的廳堂。貫休入蜀之前曾在廬山東林寺駐錫三年，對東林十八高賢的傳說和圖像理應非常了解，很可能畫過十八羅漢圖。且據《益州名畫錄》，貫休曾「師閻立本畫羅漢十六幀」，既然貫休在繪畫上受到閻立本的影響，而閻立本又是最早畫十八學士題材者，則貫休繪十八羅漢又多了一重可能性。現存一枚北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製作的銅鏡，背面有銘文云「鮑公浩莊嚴敬造大阿羅漢一十八身」和「依禪月畫像以七寶」，即將禪月大師貫休的十八羅漢畫複製在銅鏡背面。

據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盧楞伽畫六尊者像贊〉，則早在貫休之前，八世紀時的盧楞伽就已畫過十八羅漢，「蓋畫本十八，茲僅存其三之一，既已失去大半，則裝裱時前後次第顛倒亦理所必有」。《六尊者像》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陳清香認為此畫非盧楞伽所作，其創作年代也不可能早於五代，同時，她也慎重地指出畫中人物的布局仍遺部分唐風，不排除由盧楞伽所起稿本，後世再輾轉相摹的可能性。《宣和畫譜》之前的著錄中沒有提到盧楞伽曾畫過羅漢，而《宣和畫譜》載盧楞伽畫過十六羅漢像則被李玉　判定為宋代羅漢信仰興盛後的偽託。不過，既然作於唐代天寶年間的〈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中已經出現了十八羅漢的稱呼，那麼，即便盧楞伽不曾畫過十八羅漢，唐代出現十八羅漢圖也絕非毫無可能。

江蘇吳縣保聖寺傳為唐代楊惠之所塑的十八羅漢像也屬於同樣的情況，中日許多學者對於「楊塑說」提出了質疑，認為當屬北宋祥符年間（1008-1016）重修時的作品。可是重修之前，存在楊惠之塑十八羅漢像的可能性，

佛光山 人向佛教 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這是不能斷然否定的。以往學者多持十八羅漢題材始見於五代的觀點，可是我們認為，唐代已經出現了十八羅漢信仰，很可能也出現了十八羅漢造像。

從地理位置上講，杭州很可能為十八羅漢的發源地。最早出現十八羅漢稱呼的「龍泉寺故大律師碑」位在杭州餘杭縣；而中國現存最早的一組不完整的十八羅漢像，常青認為是雕刻於吳越國時期的杭州煙霞洞的十五身羅漢。[12] 文獻和圖像資料皆首現於杭州，想必不是偶然的。台灣地區的十八羅漢當中，除了梁武帝和寶誌和尚，也有混入達摩和布袋和尚的情況，陳清香指出，此四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曾住過江南，其神通事蹟皆曾流傳於金陵、杭州一帶，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杭州與十八羅漢起源的密切關聯。

綜上所述，十八羅漢信仰起源於八世紀時的杭州地區，這一結論似無大謬。而十八羅漢圖像的出現時間目前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不過考慮到十世紀初十八羅漢的圖像已經流行開來，那麼九世紀甚至八世紀出現十八羅漢圖像也就有了極大可能，畢竟七世紀時就有了十八學士圖。當然，更加確定的結論還有待新資料的挖掘與發現。

二、十八羅漢多出來的兩位究竟是誰？

為十八羅漢造像須要知道十八羅漢的名號才行，可是《法住記》只明確了十六位羅漢的名號，那麼這多出來的兩位羅漢究竟是誰呢？

關於十八羅漢名號的最早紀錄，出自北宋大文豪蘇軾之手。蘇軾在謫居海南島時（1097-1100），從民間得到前蜀畫家張玄（活動於 890-930）所繪

12. 常青：〈十八羅漢與五百羅漢：羅漢造像的中國化〉，載《徐蘋芳先生紀年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蘋芳先生紀年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361。

佛光山 人向佛教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十八大阿羅漢，以之為「希闊之遇」，[13] 設香花供養並題寫了十八首讚語，可惜，蘇軾在這裡並未列出十八羅漢的名號。後來，蘇軾獲赦北歸，路過廣東省清遠市清遠峽寶林寺時（1100），看見貫休繪製的十八羅漢，再作十八首讚言，這次蘇軾一一標註出眾羅漢的名號，其中前十六位皆取自《法住記》，第十七位稱為「慶友尊者」，第十八位稱為「賓頭盧尊者」。[14] 慶友，即《法住記》的傳出者；賓頭盧，應為第一尊者「賓度羅跋羅惰闍」的重出。北宋時期出現的偽經《十六阿羅漢因果識見頌》中，將第一尊者稱作「跋羅馱闍」，或許能夠說明北宋時，人們將賓頭盧作為單獨的一位聖僧，而不與十六羅漢中的第一尊者視為等同。

除了蘇軾外，與他有交往的北宋僧人惠洪（1071-1128）在其所著《冷齋夜話》中，也有貫休繪十八羅漢像的記載：「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15] 兩宋之際的葛勝仲（1072-1144）有《十八羅漢贊》，序裡說他曾經讓人摹寫貫休畫大阿羅漢十八軀。相傳日僧俊芿在南宋嘉定四年（1211）於浙江省臨安府（今杭州）開化寺，得到了一組水墨十八羅漢圖，據說出自貫休之手，且第十七幅為慶友尊者。這些應該都是與蘇軾所見屬於同種類型的貫休十八羅漢圖。不過，現在可以看到的貫休羅漢圖的摹本，一是在日本皇宮內廳的宋初臨摹畫，一是在杭州碑林中摹刻的石刻，都是十六位。

羅香林曾經比對過桂林華蓋庵所摹刻杭州聖因寺貫休繪十六羅漢像，與

13. 蘇軾：〈十八大阿羅漢頌〉，徐長孺輯：《東坡禪喜集》卷 1，《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頁 66 上。
14. 蘇軾：〈自南海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徐長孺輯：《東坡禪喜集》卷 2，《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頁 682 上 -686 上。
15. 宋．惠洪、朱弁、吳沆撰，陳新點校：《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0。

《法住記》所載十六羅漢的名號，發現其中完全相異的有三尊，列表如下：

序號	《法住記》	貫休羅漢像
第三尊	迦諾迦跋釐墮闍	賓頭盧頗羅墮誓
第四尊	蘇頻陀	難提密多羅（慶友）
第五尊	諾矩羅	拔諾迦

很明顯，貫休羅漢像中位列第三的賓頭盧頗羅墮誓，是第一位賓度羅跋羅惰闍的重出。羅先生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或許是貫休死後，佛徒蒐集其所繪羅漢像時，誤以二帙賓度羅像合置一處，以補其所缺第三尊者迦諾迦跋釐墮闍之畫像。至於為什麼貫休以慶友來代替蘇頻陀，羅先生認為，或是因為蘇頻陀在佛經中其他地方沒有出現過，而慶友作為《法住記》之傳出者，以之列為第四尊者，更足以加重崇奉十六羅漢者之信念。而將諾矩羅易為拔諾迦，羅先生也認為並非隨意杜撰，因為其與清代章嘉國師所述第九尊者拔嘎沽拉相同。蘇軾所記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恰巧與華蓋庵所刻之第四尊者和第三尊者相同。羅先生認為，蘇軾所見，應為貫休所繪十六羅漢之底本補入《法住記》所記第三尊者迦諾迦跋釐墮闍與第四尊者蘇頻陀二人畫像，合之而成十八羅漢像。

佛教文獻正式明文記錄十八羅漢名稱，最早出於南宋末年僧人志磐所著《佛祖統紀》。志磐根據唐代僧人湛然（711-782）的《法華文句記》「除四大羅漢、十六羅漢，餘皆入滅」認為，十八羅漢中的後兩位應為住世四大羅漢中不在十六羅漢之內的兩位，即迦葉和軍徒缽歎。針對十八羅漢中的後兩位為慶友和賓頭盧的說法，志磐特意糾正，賓頭盧為賓度羅的重複，而慶友是《法住記》的作者，不在住世之列。

關於賓頭盧即為賓度羅，宋僧法雲在其所編《翻譯名義集》中也說：「賓

佛光山 人向佛教 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頭盧……或云賓度羅跋羅墮闍。」[16] 志磐強調十八羅漢的說法當以《法華文句記》為準，他還提到北宋僧人淨覺（992-1064）所撰《羅漢禮贊文》依據的就是《法華文句記》，即增加了迦葉和軍徒缽歎的十八羅漢。[17]

志磐是一位非常喜歡考究「團體中的個體」的僧人。《卍新續藏》第 78 冊收有《東林十八高賢傳》，作者不詳，卷首有李伯時作於元豐三年（1080）的《蓮社十八賢圖》及黃汝亨（1558-1626）序，書末附〈百二十三人傳〉（七人）、〈不入社諸賢傳〉（三人）及跋文。北宋陳舜俞（1026-1076）《廬山記》載其文，曰：「東林寺舊有《十八賢傳》，不知何人所作，文字淺近，以事驗諸前史，往往乖謬，讀者陋之，使古人風跡用無知者，惜哉。予既作山記，乃因舊本參質晉宋史及《高僧傳》，粗加刊正。」志磐《佛祖統紀》亦載《十八賢傳》，並云：「《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跡疎略復為詳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依悟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矣。」[18]

湯用彤指出，《十八高賢傳》乃妄人雜取舊史、采摭無稽傳說而成，經過陳舜俞、志磐等人修正後加入了可靠材料，「然志磐師懷悟之意為之詳補，為不入社三人立傳，又強集無關之人入百二十三人名錄中，則亦不可信也」。[19] 考慮到晚唐時已有十八高賢的影堂，倘若不知道他們的名號，很難想像可以為其造像，因此，《十八高賢傳》的出現時間應在中晚唐。

從佛教的教義和經典方面來看，志磐對十八羅漢的「正名」無疑是「如

16. 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藏》第 54 冊，頁 1064 中。
17.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33，《大正藏》第 49 冊，頁 319 中。
18.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26，《大正藏》第 49 冊，頁 268 下。
1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294。

法」的，然而佛教信仰的傳播從來就不是完全依照「正統」行事，一種「偶然的錯誤」在得到有影響力的人物認可並廣泛傳揚開來後，它就會作為一種穩定的傳統得到繼承和推廣，深植人心，久而久之，沒有人再去探討它的對錯，而只一味地信仰了。

南宋紹興四年（1134）「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碑」和「廣西會仙山白龍洞五百羅漢尊號碑」，於五百羅漢尊號前皆列十八羅漢尊號，也是第十七為慶友，第十八為賓頭盧，可見組合了慶友和賓頭盧的十八羅漢體系的影響之大。當然，組合了迦葉與軍徒缽歎的十八羅漢體系也依然留存下來，山西長子崇慶寺北宋十八羅漢像與洛陽白馬寺元代十八羅漢像中，就有迦葉和君徒缽歎，其中，白馬寺羅漢像中的迦葉和君徒缽歎兩位尊者，還被塑造成了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現藏日本京都清涼寺的羅漢畫十六幅，被確定為北宋初年的作品，陳清香先生根據其中出現迦葉和君徒缽歎而指出，此畫原套很可能是十八羅漢，因後來失去兩幅而成為如今的十六幅。若真如此，則在志磐之前的北宋初期，已經出現了包含迦葉和君徒缽歎在內的十八羅漢體系。

另外，還有推論將《法住記》的述說者慶友尊者和譯者玄奘法師組合起來，作為十八羅漢中多出來的兩位，白化文認為這種設想極可能符合最早的事實，但歲久年深，已難於找到確切證明。[20]《法住記》中已明言慶友為六通羅漢，而玄奘去世後不久，也出現了將他聖化為羅漢的情況，建立於開元四年（716）的「西明寺塔碑」稱玄奘為「應真」，即羅漢，「三藏法師玄奘惟應真乎，迺成果者」，並且在文末頌詞中將玄奘比擬為迦葉。[21] 那為什麼玄奘後來被賓頭盧所取代？白化文認為，這恐怕由於中國古代的「夷夏」觀

20. 白化文：〈中國的羅漢與羅漢畫〉，載上海博物館編：《翰墨薈萃：細讀美國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15。
21. 劉淑芬：〈唐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2017 年第 1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1-23。

佛光山 人向佛教 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念較強，不願意把本國的玄奘法師和那十七位出身、年代、國籍都不同的「外來戶」摻和在一起。不過，既然十八羅漢本來就是中國人的創造發明，不受經典依據的束縛，在民間還是時有將本土人物混入其中的情況。

江蘇吳縣保聖寺北宋十八羅漢像中的一尊，據日本學者大村西崖《塑壁殘影》的記載，「邑人呼之為梁武帝」，台灣寺廟中的十八羅漢也有在十六羅漢的基礎上加上梁武帝與寶誌和尚的情形。[22] 南宋時，梁武帝已被信徒視作羅漢，志磐在《佛祖統紀》中明言梁武帝是「住世四果聖人」。[23] 而寶誌和尚作為梁武帝時期的神僧，雖然一直被看作十一面觀音的化身，但由於中國人信仰的雜糅特點，一個僧人往往既被認為是菩薩的顯化，又同時被看作是羅漢的化身。由南宋明州（今寧波）畫工所作《大德寺五百羅漢圖》中，有一幅「應身觀音」（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描繪張僧繇為寶誌作像，而寶誌現多面觀音像的情景；這裡又把他吸納到五百羅漢隊伍當中，寶誌又有了一重羅漢的身分。由此來看，梁武帝與寶誌進入十八羅漢的隊伍並非毫無典據。

除了菩薩的化身可以進入到羅漢隊伍，佛的化身同樣也被羅漢隊伍「收編」。在西藏地區的十八羅漢體系中，就有被認為是彌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西藏原先僅有十六羅漢，後來出現十八羅漢應當是受到中原佛教的影響，可這多出來的兩位卻與漢地有異，而是布袋和尚及達摩多羅（又稱法增居士），或摩耶夫人和彌勒。

清朝的時候，乾隆皇帝在章嘉國師的建議下，將十八羅漢多出來的兩位定名為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乾隆皇帝在《宋李公麟畫十八羅漢》畫軸上的題跋中說：「世俗相傳十八阿羅漢，雖以蘇軾之精通禪悅，亦未能深考博究。

22. 陳清香：《羅漢圖像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版。
23.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41，《大正藏》第 49 冊，頁 381 下。

嘗諮之章嘉國師，知西域止有十六應真，又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亦得稱羅漢。」在〈御制唐貫休十八羅漢贊〉裡，乾隆又說：「今重閱《秘殿珠林》貫休羅漢像十幀，其八並列二像，與前所定數悉合。其二像各一，則世所為降龍、伏虎者也。始覽而疑之，復詢諸章嘉，則一為嘎沙鴉巴尊者，一為納納達密答喇尊者，乃知西域十六應真之外，原別有降龍、伏虎二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羅漢名。」另外，在〈盧楞伽畫六尊者像贊〉中，乾隆皇帝亦說：「復證以貫休十八應真畫軸，不但降龍伏虎適肖神通，即其餘結相供具，亦髣髴印合。」

前面已講，貫休並沒有畫過降龍或者伏虎立意的羅漢，乾隆皇帝所見包括降龍、伏虎的貫休十八羅漢圖殊為可疑。無論如何，經過皇帝的認定，包含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名稱的十八羅漢體系由此定型。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作為羅漢名稱進入十八羅漢體系是較晚的事情，然而龍、虎形象出現在羅漢圖像中的時間則要早得多。

三、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的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

在當今中國佛教界，十八羅漢又有了最新發展，即星雲大師提出的十八羅漢組合，包括大迦葉、阿難陀、舍利弗、目犍連、阿那律、富樓那、迦旃延、須菩提、優波離、羅睺羅、大愛道、蓮華色、妙賢、迦留陀夷、周利槃陀伽、賓頭盧等尊者，以及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我們稱為「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因其具有強烈的創新性和時代性，迅速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喜愛，產生了較大影響。

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的產生，是中國羅漢信仰發展的一次大變革與新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佛光山 人间佛教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一）明確將佛弟子崇拜納入到羅漢信仰體系當中

關於唐以前的中國是否存在羅漢信仰，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有學者認為，唐以前的中國存在對佛弟子的崇拜，但是佛弟子崇拜並不等於羅漢信仰，真正的羅漢信仰是從唐代開始興起並逐漸發展興盛。我們認為，這一看法切斷了中國羅漢信仰的完整脈絡，窄化了羅漢信仰的基本內涵。

羅漢信仰是佛教中的一類信仰，它包括豐富多采的內容，佛陀在世時的十大弟子各有所長，乃教團之重要人物，皆為證果阿羅漢，是屬於羅漢信仰的重要一環。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將佛陀十大弟子全部吸納進來，解決了這一問題引起的疑惑，對於我們釐清羅漢信仰的內涵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十大弟子在早期佛教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將他們吸收到十八羅漢的隊伍當中，充分體現了對佛教史的尊重。

（二）首次將具名的女性羅漢吸收進羅漢信仰裡面

阿羅漢是佛教史上出現最早的一個目標意義上的宗教概念，早期佛經中明確記載了許多比丘尼證羅漢果的故事，而記載相對簡單模糊並因此後來引起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在家居士能否證得羅漢，這與後來大乘佛教中關於女性是否需要轉男身成佛的討論截然不同。星雲大師多年來一直提倡佛教四眾平等，特別關注女眾與在家信徒對於當今佛教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與重要的價值。十八羅漢本身是大乘化的信仰形態，在其中加入三尊女性羅漢，這既符合羅漢概念本有的突出性別平等的特點，又可以激發當今佛教界中潛存的巨大女性力量，是在遵循佛教傳統基礎上作出適應時代變化的調整。

女性與佛教的關係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話題，長期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女性在佛教中的地位較為邊緣，身為女性究竟應該如何修行？如何投身於自己的信仰事業當中？這些問題隨著女性在社會各行業當中話語權的增強，也開

始引起教界的關注。星雲大師以開放的胸襟和過人的勇氣，在十八羅漢隊伍當中增加佛教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三尊具名的女羅漢，這一精妙的善巧設計，對於提升女性信眾的自信心，對於我們重新思考男女二眾的關係等問題，都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

（三）與星雲大師倡導「回歸佛陀本懷」的宗旨相契

星雲大師強調，所謂人間佛教不是佛教發展的新形態，而是佛教本有的模樣，是「回歸佛陀本懷」。佛光山系統的十八位羅漢除了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外，其他十六位全是佛陀在世時親聞佛陀說法、親受佛陀教誨的聲聞弟子，在佛教經典中都有具體詳細的記載，能夠讓信眾對於他們有依託於經典的具體實在的認知。而且早期佛教中的羅漢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濃濃的人情味，佛經敘事較為樸實，很容易給人榜樣的力量，這與中國傳統的十八羅漢信仰當中，對於神通、感應的渲染差異較大，符合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特色。可見，星雲大師創立新的十八羅漢系統與其傳播的教法是相呼應的。

（四）立足中國佛教本位，繼承中國佛教傳統

十八羅漢本就是中國化的產物，是中國人的創造發明，它沒有佛教的經典依據，自從產生以來，關於多出來的兩位（相較十六羅漢來說）究竟是誰一直沒有定論，因此，星雲大師根據時代變化與社會需求，調整出一組新的十八羅漢系統，可以說是立足中國佛教本位，對中國佛教傳統的繼承。在大師創立的十八羅漢體系當中，保留了原有的四尊羅漢，即賓頭盧尊者、周利槃陀伽尊者、降龍羅漢和伏虎羅漢。賓頭盧尊者與周利槃陀伽尊者是十六羅漢的第一位和最後一位尊者，是十六羅漢的集中體現，加上降龍與伏虎二羅漢是中國最流行的十八羅漢組合，這說明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包含了原有

佛光山 人间佛教 研究院
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的十八羅漢系統，並在此基礎上作了延伸與擴容，這是大師充分了解信眾信仰基礎以及中國羅漢信仰歷史的表現，是星雲大師高超智慧的又一次展現。回歸佛陀本懷並非要將中國化的部分剔除出去，而是在尊重與堅持中國佛教傳統的基礎上對佛陀精神的回溯。

（五）佛光山系統十八羅漢表現重慧解的鮮明特點

中國傳統羅漢信仰的特點是強調儀式、圖像與靈應，在羅漢的哲理內涵與思想文化方面的挖掘較為缺乏。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在每一尊羅漢像所配的文字解說中，突出了羅漢的高超智慧與高貴品格，這是佛光山人間佛教重慧解的一種表現。當然，需要承認的是，在這一方面仍存在不足，還需要更多的理論構建與昇華。

（六）彰顯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不二」性格

佛光山系統的十八羅漢表現出中外文化的融合、男女二眾的融合、顯教密教的融合和大小乘的融合，是佛光山人間佛教「不二」性格的又一重要體現。對於這樣一組極具時代性並兼顧傳統的新型信仰組合，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而它的傳播與流布也有待時間的檢驗。

人間佛教重視當下的淨土，
致力於解決人間各種問題，
所謂「以出世思想作入世事業」，
屬於菩薩乘的思想；
主張「人成即佛成」，
也是以聲聞、緣覺出世的思想，
做人天乘入世的事業，進而實踐菩薩道的慧業。

～《人間佛教語錄》